

学林

← (上接7版)

以上只觅轨迹,不评观点。我想,卫礼贤其他著述中,可能还有痕可循。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为此再作小结,记下本文所议卫礼贤涉佛脚印(范围缩小到佛学知识):

1922年,与钢和泰认真讨论翻译佛经,并试译佛教评论(根据卫礼贤未发表日记);

1923年包括更早,比较佛学与《易经》,评议涅槃(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年包括更早,综合比较佛教与道教基本观点(根据遗孀摘引的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1929年,反复援引佛学讲解《易经》,关注北方/传佛教,提及禅宗。(根据卫礼贤

本人著述);

1928年左右,可能远距参与翻译佛经的具体项目(根据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回忆);

1928—1929年,与太虚商定大规模翻译佛经(根据文献记载,基于当时记录和/或另一当事人太虚回忆);

1928—1929年,为太虚口译佛学演讲并代讲(根据文献记载,同上);

1929年包括更早,不断比较佛与道,了解佛教宗派如大乘和天台,讨论纯佛教等概念(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连续性显见,细节需充实,思路历程待探讨。

未及结论的尾声：  
思考线索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翻译佛经项目,与卫礼

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从我熟悉的父亲习惯,他回忆此事多用“Wilhelm”而极少用“卫礼贤”,也提示了可供还原当时语境之参考信息。(辨析习惯和语境等,得综合各个层面,将牵涉到有机梳理史料等较大论题,非数语可解释,容另议。)

近年来整理父亲资料,时逢父亲所历不同于定论、众说或已发表的他人所述。我每每彷徨,不知何倚何从。可是,一件接着一件,已遇多个例证,父亲的记忆有理有据,可供纠误和填缺。较近一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回忆斯文·赫定片断:采集品放行瑞典案》(载《古今论衡》第30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补充了不少斯文·赫定不甚清楚的内情。更有意思的是,文内讨论一个地点,

赫定在事后几年内出版的书面报告,与父亲在几十年后的口述回忆不一样。我先取赫定之说,但旋即发现当年即时会议记录,所录地点却正是父亲这位现场经手人所忆。

回望时约四载的本专题探究过程,我的注意力半途转向卫礼贤佛缘循迹,庆幸有所获。然而,对我最关心之事,即沈仲章与卫礼贤的佛缘历程如何相交,仍无足够材料可下结论,离终点尚远。

叹息力量有限,人生有涯。我最想弄清楚的这一问题,也许终不可解。好在因父亲回忆而起的探索之旅,也是一种经历。

探索多歧路,除了继续搜寻沈仲章遗存资料,谨在此标志另三条值得追踪之线:

其一,最近听说,鲁雅文长女鲁幼兰怀念在北平的童年,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于是我顿感亲近,父亲天性喜欢跟孩子玩,会不会当年逗

过牙牙学语的鲁幼兰?又听说提及鲁雅文的中国缘,会让九十多岁的鲁幼兰欣慰,这便成了促我抓紧完成本文的一大动机。此外,我已邀请鲁雅道,合作撰文介绍鲁雅文。但愿通过细察鲁雅文涉佛之前因果同,又能得到新的启迪。

其二,关于由钢和泰策划促进的翻译佛经之举,以及由他引导研习梵文和佛学之人,不知学界是否已作详尽梳理?

其三,我翻阅卫礼贤著作,瞥见卫德明涉佛之痕。可惜目前无暇分身,探讨卫公子对佛学的兴趣是否因卫礼贤引导。我想,卫德明本人可自成一题,建议有志者关注。而分析卫氏父子佛缘有无因果传承,或许也将有助于思索卫礼贤与鲁雅文译经有无因缘沿续。

借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语,盼“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溯源疏流,“共参究之”。

近日于上海图书馆查阅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新见陈望道佚文七篇。这些作品未收入《陈望道全集》(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笔者整理在此,希望于学界的陈望道研究有益。

一、《战时的专门教育》《文化工具的运用》和《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韦恂、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战救亡活动。这三篇短论当写于回沪后不久。分别发表于1937年10月12日、11月1日、11月18日的《申报》“专论”一栏上。每篇均署名“陈望道”。

其中《战时的专门教育》一文,陈望道从专门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教育机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以为战时学校搬迁应该“跟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需要相配合”,按照战时的需要及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他也对系科的课程修订提出切实的改革意见,包括“添加战时的共同必修课”“将课程中有关现局的部分多加发挥”“在正课外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在《文化工具的运用》一文中,陈望道阐述了文化工具在抗战文化动员中的力量和作用。为了便于团结更多的民众投入抗战,陈望道主张在战时普及普通话,相比方言和文言,他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文化工具。

《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是陈望道有感于沈起予“悲哀的文学”而发。《光明》编辑沈起予发表《悲哀的文学》一文,其大意是“在这回的抗日战事中,‘根本有无数悲哀的事发生’,该用来写‘悲哀的文学’。”此论一出,引发了当时抗战文艺界的一番讨论,其中即包括陈望道。针对沈氏的“悲哀”论,陈望道提出以“悲

陈望道抗战期间的七篇佚文

陈启明

壮”代替“悲哀”,他说“‘不惜一死’是‘壮烈’的,这样壮烈的悲哀似乎并不是单单‘悲哀’两个字所能包括。”“我国文学上原来不少善于抒发悲壮情感描写的悲壮事实的文献,现在又正是这种文学产生的时期。无数悲壮的事实正在不断的出现,我们定会有无数悲壮的文学不断地产生。”在肯定文学创作个性化的同时,陈望道主张在抗战的意志上,在抗战的认识上,需要推行大众的教育,来开发大众的认识,齐一大众的意志。以上一组专论,皆是针对抗战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言简而意赅,体现出陈望道那种务去空言、好学力行的可贵精神。

二、《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

《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发表于1938年10月11日、10月18日的《申报》“自由谈”一栏。两篇皆署名“齐明”。“齐明”应是陈望道在此时期所用的一个笔名。这一笔名,又见于1939年4月发表于《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一期上的《生活和理想——〈实证美学的基础〉的一章》(与虞人合译),同年同月发表于《综合半月刊》第二期上的《〈实证美学的基础〉译序》,1939年7月发表于《现实(上海1939)》的创刊号上的《绘画的文章体式 and 峨特式建筑艺术及上海的圣三一堂》,及同年同月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与虞人合译的卢那卡尔斯基《实证美学的基础》一书。

陈望道同《申报》“自由谈”栏目关系十分密切。1934年6月,陈望道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陈子展等针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和“读

经尊孔”等反动思潮,发动了“大众语”运动,《申报》“自由谈”正是这次全国性语文大论战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自由谈”曾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10日《申报》沪版复刊后,副刊“自由谈”亦随之恢复。这两篇署名“齐明”的文章,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栏目复刊后的第一、二期。此为陈望道所作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明。

陈望道在《关于颜色》一文中分析了颜色词的语言特点,“颜色也是一种话。这也有外国话,有本国话。”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实例,比如说到“我在热天穿长衫回到乡下去,乡人不认识的常常说‘出丧了吗’我总觉得他们是怪可爱的,他们是懂得中国的颜色话的人。”同一颜色词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由此他注意到对颜色词的说明是非常困难却又必不可少的。

而《新美的形成》一文,则是关于抗战文学创作的一篇评论。针对一般风行的柔性美,陈望道认为在抗战文艺上更应推崇具有“身负苍穹之重”的崇高美。文中他特别引用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一段话,“新的人民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亚特拉斯(Atlas)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他认为抗战中比较出色地描写这种“人民的雄姿”的,是姚雪垠写的《差半车麦秸》。同时,他还引用了胡风《新女性礼赞》诗,认为“现在正是转变柔弱优美为雄伟崇高的时代。一般弱不禁风的黛玉,也都将变成了肩抗苍穹的亚

特拉斯。”两篇短文,或论修辞,或议美学,在内容与陈望道一直以来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多有呼应,可以断定出于陈望道的手笔。

三、《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和《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

《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和《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所署的笔名“雪帆”,也是陈望道多次用过的笔名。1938年5月发表于《华美》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的《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补记》,1940年发表在《长风(上海1940)》第一卷第一期的《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均用“雪帆”这个笔名。到1947年,陈望道仍用这个笔名写了《谈杂文体和大众化》,发表在《新语文》第一期。

陈望道在1939年8月《现实(上海1939)》第二期上发表《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一文,不是偶然的。陈望道长期以来热心推进进步的语文活动。1938年陈望道和陈鹤琴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在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每日译报》上创办了一个实践新文字的副刊——《语文周刊》,由陈望道任主编。就在发表《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一文后不久,于11月3日至12日陈望道还主持举办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语文展览。

在这篇短文中,陈望道着重介绍了五十二种比较知名的关于语文文献书目,以供从事搜集或研究语文史料者参考。同时,他也分析了近代语文存在的四大问题,即文法、语言统一、文字普及、语文合一。他认为“这些问题源远流长,如语文合一,最低限度可以追溯到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再如与文法有关的‘词类连书’,或‘语部分写’,普通以为是五四前后拼音文字运动者所主张,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蔡锡勇”。文末作者还特别附录

语文学文献书目五十二种,并一一标列各书之出版年份(中西历),出版地,著作人姓名、籍贯以及附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含附录)堪称陈望道随后发表于1939年11月《文艺思潮》第二卷第一期上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新潮》一文的姊妹篇。后者正是在前者的文献基础上完整而详实地梳理了明末以来中国拼音文字的演化进程。这篇佚文的发现,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到此一阶段陈望道对拉丁化新文字持续而深入的探索痕迹。

《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一文发表于1942年《东方文化》第一卷第四期。陈望道从历史性的视角介绍了从明初至清末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以及散文演变的阶段。他从“朝政的腐败”“结社的纷起”两端推究明代散文反见发达的原因,从“时代生活影响文风”“文人心理的倾向”推究明清散文的演化。他以为“人类的某种演进,往往非待生活达到某种阶段,是不能实现,比方现代的新文艺,不能在中西隔阂的时代产生,就是一个简明的例子。”特别强调时代环境对文学所具有的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他还提出“舍其旧而谋是新”,“以推陈出新的方法,使一切文化,继续向前发展。我们鉴于以往的失着,今后当如何致力于新文化的创造。”早在三十年代初,陈望道曾译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川口浩的《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问题》,服膺川氏所论“不是人类意识决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存在决定自己的意识”,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给了不可移易的解决的锁钥。”而此文所透现出的正是陈望道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和方法。